明定陵出土丝织品纹样初探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Patterns of Silk Textiles Unearthed from Ming-dynasty Dingling Imperial Mausoleum

王丽梅

Wang Limei

内容提要：

明定陵出土的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等丝织品多达644件，其上的纹样题材丰富、图案华美，这与纹样内容取材和纹样的组织安排密不可分。定陵出土的丝织品纹样不仅有代表皇权的龙纹、凤纹，还汲取了民间传统内容，取材广泛，种类繁多，在纹样的组织安排上也表现出灵活多样、富于变化的特点。定陵出土丝织品纹样不仅再现了我国古代丝织品纹样的华美精致，更反映出了明代中后期宫廷服饰的变化特点。

关键词：

明代　丝织品　纹样

ABSTRACT:

Over 644 items of silk textiles were unearthed from Ming dynasty's Dingling Imperial Mausoleum, including attire, adornments, rolls of cloth, and various other types, featuring a great variety of patterns and elegant designs. The motif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terial selection and the arrangement of patterns. The patterns of silk textiles unearthed from the Mausoleum draw inspirations not only from dragon and phoenix motifs, which embody imperial power, but from folklore and traditional imagery. In addition, the patterns are painstakingly organized to show rich variations and great diversity of forms. These textiles represent the elegance and exquisit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ilk textile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 the transform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t attire in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1368-1644).

KEYWORDS:

Ming dynasty, silk textiles, pattern

一 纹样内容题材

丝织纹样与其本身的用途、时代风尚密切相关。它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此，它必然反映出使用者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作为宫廷御用品，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图案纹样则必然要符合礼制章服制度。故而代表皇权的龙纹、十二章图案成为首选。而内容丰富、具有浓郁的生活色彩、充满生活情调的民间传统图案也占有相当的数量。

（一）御用纹样

1. 龙纹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具有伟大神力的奇异动物。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把龙作为崇拜的图腾，并赋予其极为丰富的社会属性。进入封建社会，龙又演变成人君的象征，而以其制作的纹饰也成为皇家标识，并为之垄断。

定陵出土的万历帝丝织物近 300 件，涉及从衮服到鞋袜的 20 多个种类。其中，大件服饰，如龙袍以及袍料[1]计有 109 件。在这 109 件服饰名称中，除 4 件不涉及“龙”字之外，其余均有“团龙”、“龙襕”、“龙云”、“绣龙”等字样。龙纹不仅反复出现，而且装饰的部位也十分明显。龙袍及袍料的前胸、后背、衣袖及肩部基本都饰有较大型的龙纹，在衣领、袖口或衣襟处则饰有相对较小的龙纹。

衮服是古代帝王的礼服，其上有特定的 12 种纹饰，即日、月、星辰、龙、山、华虫、宗彝、火、藻、粉米、黼和黻。明朝建立，“国朝上下冠服皆损益前代之制”[2]，其制在《明史》、《大明会典》等古籍中均有记载。“洪武元年，学士陶安请制五冕。太祖曰此礼太繁，命祭天地、宗庙服衮服。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3]洪武三年更定：“正旦、冬至、圣节并服衮服，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4]。洪武十六年，定冕服之制。其中，衮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山、龙、华虫六章织于衣，宗彝、火、藻、粉米、黼和黻六章绣在裳。永乐三年，对衮服十二章纹饰进行更定：玄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嘉靖八年再一次更定：衣玄色，织六章，日、月在肩，各径五寸；星辰、山在后；龙、华虫在袖。裳黄色，绣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为二行，粉米、黼、黻为二行[5]。

定陵共出土衮服 5 件，其形制、纹样基本相同：前胸后背正中纵列三团龙，两袖各饰一升龙，左右两侧横摆处饰二团龙。左、右肩分别饰日、月，背部饰星辰和山，两袖各饰二华虫，宗彝、火、藻、粉米、黼和黻六纹样，自上而下纵向分列于前胸后背的三团龙两侧。

定陵出土的衮服不仅在形制上将上衣下裳合而为一，而且在纹样上也进行了重大改动，龙纹数量已多达 12 个，且位置突出。显而易见，龙纹在十二章纹样中已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他 11 种纹样成为了龙纹

1 袍料：定陵出土的袍料，均已按服饰的具体形制、规格尺寸，在匹料的不同部位上设计出特定的纹样，依纹样织出，并只需依照既定的格式进行剪裁、缝制就可成衣。故将其归入服饰类。

2 《大明会典》卷六十《冠服一》。

3 《明史》卷六六，《舆服志》。

4 《明史》卷六六，《舆服志》。

5 《大明会典》卷六十，《冠服一》。



图一　复制十二章衮服

的辅助装饰〔图一〕。

2. 凤纹

凤，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和百鸟之王，是人们心目中的瑞鸟，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人认为时逢太平盛世，便有凤凰飞来。凤与风在甲骨文写法相同，即代表具有风的无所不在、灵性力量的意思。传说凤在飞翔五百年后，便负香木飞入太阳神庙中，在神坛上自焚，第二日便有雏凤出生，而且已着毛羽，第三日则羽翼已丰满，辞庙主而飞去。凤能于烈火中再生，使之更具有了美好、才智和吉祥的象征。

随着封建皇权的建立、强化，凤又成为了中国皇权的象征。它常和龙一起使用。使用时凤从属于龙，与龙代表皇帝，凤代表皇后嫔妃相一致。

定陵出土丝织品纹样中的凤纹不是很多，但纹样都很精美，有“龙凤纹”、“凤穿花纹”和“人物云凤纹”等。

孝靖皇后的一件夹衣上的胸补和背补均绣制了“凤穿花纹”：二凤一升一降，展翅飞翔于花卉之中、云海之上。孝靖皇后的另一件夹衣的胸部和背补上则绣制“人物云凤纹”。纹样的下部或绣寿山福海、八宝、花卉，或绣海浪、八宝及海草纹，中间则饰文官和侍者，上部则是飞翔、争鸣的凤纹。其形象生动。另有一件匹料，其纹样名为“缠枝四季花卉凤凰纹”。纹样中的凤凰为升降姿态，头部相对。凤纹之间饰牡丹、莲花、菊花、芙蓉四季花卉。凤凰舒展着双翅，穿梭于花卉之中，形态优美，栩栩如生〔图二〕。

3. 云纹

在定陵出土丝织品纹样中，云纹占有较大比例，应用也最为广泛。

云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自然现象，但是，其高高在天，且形状飘忽不定，给人以深奥莫测的感觉。因此，云以祥瑞之象常常出现在传统纹饰中。而龙均来于天，行于空，所以，云纹也就成了龙纹不可或缺的点缀。定陵出土丝织品云纹在与龙纹相配时，因龙的姿态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纹样。龙的动态鲜明时，其四周的行云、勾云、卧云纹较多，且云纹纹样富于变化，不呆板，衬托出龙升腾飞跃的动态之美。如果纹样中的龙纹排列规律性较强，呈团龙形时，云纹一般会与龙纹有规律搭配排列，而且多采用如意云纹、四合如意云纹。

除了与龙纹搭配，定陵出土的纹样中，云纹还常与仙鹤、奔兔、仙道宝物等一起使用，使仙鹤、奔兔、仙道宝物更带有飘逸、虚幻的神秘感。有些纹样则只用于如意云纹或四合如意云纹，并作规则排列，图案精炼大气。



图二　缠枝四季花卉凤凰纹

（二）取材于民间的优秀传统图案

定陵出土的丝织纹样除帝后特定的章服样式，作为常服，尤其是后妃的服饰，还有一大批取材于民间的优美图案。它们既符合皇室御用的富丽华贵，又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批纹样大致可归为三类，即大自然的动、植物；风土人情、传统风俗；仙道宝物和吉祥图案。

1. 大自然的动、植物

此类图案取材于大自然的生物形态，多为写生纹样，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动物纹样中，既有麒麟、狮子、老虎、神鹿、玉兔、仙鹤等神兽仙鸟，也有蝙蝠、螳螂、蜈蚣、蜂蝶等常见的小型动物，甚至昆虫。而植物纹样中，有灵芝、牡丹、莲花、菊花、芙蓉、水仙、兰花、梅花等宝贵高雅的花卉，又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葫芦、桃子、石榴、藕等果实。

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之所以成为纹样图案，都与它们的品性相关。

麒麟，是传说中的仁兽、神兽。传说孔子出生前，有麒麟在他家门口前口吐玉书，意喻即将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必是贤才、国家栋梁。虎，《说文》中讲：“虎，山兽之君”，被看作是权力与威严的象征。狮子，其纹样随佛教传入我国。文殊菩萨的坐骑就是狮子。它是勇敢威猛、驱逐妖魔的化身。蝙蝠，其貌不扬，但是“蝠”字读音与幸福的“福”相同，所以，蝙蝠纹在我国传统纹样中被广泛应用。

上面说的是动物，下面再谈谈植物。灵芝，生长于深山密林，人们很难见到。同时，它又有很强的药用价值，因而往往被看得很神秘，而演义出许多祥瑞之说。《说文》中就称其为“神草”，《本草纲目》又说：“芝为瑞草，服之神仙”。莲花，在我有悠久的栽培历史，用其点染湖光山色，总是恰到好处。盛夏时节，“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而秋风乍起，那“留得残荷听雨声”更是别有一番情趣。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从来不著水，清净本因心”高贵典雅的品格更为人们所敬仰。佛教传入我国，莲花作为佛教的标志，更



图三 藕莲翔鸾纹



图四 蜂蝶草虫花卉纹

成为“净土”的象征，莲花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因此，莲花及其与之相连的荷叶、莲蓬和莲藕，都是传统纹饰的取材对象。孝靖皇后的一件立领衣的纹饰，名为“藕莲翔鸾纹”，其主要纹饰是以莲花、莲叶、莲藕、莲蓬组成簇生花组。花组紧凑，但莲花、荷叶、莲蓬和莲藕又安排的疏朗有致，生动妩媚〔图三〕。葫芦，作为传统图案，除了其观赏和实用价值外，更多地是缘于它特殊的生长习性。它藤蔓绵延，果实累累，籽粒繁多，符合人们多子多孙、子孙万代的愿望祈求。与葫芦相似，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的结构特点，也成为了多子多福、繁衍昌盛的象征。

对这些大自然的生物形态，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工匠艺人以他们大胆地夸张、高度的提炼和精美的组合，展示出了一幅幅充满美好情感的优美画面。

孝靖皇后的一件丝绵袄纹样，名为“蜂蝶草虫花卉纹”：在萱草、扶桑等花卉之间，蜂蝶飞舞，螳螂爬行。整个纹样极富浓郁的自然情趣〔图四〕。孝端皇后一件月白绸立领夹衣的纹样，名为“蜂蝶梅花纹”：中间大朵折枝梅花盛开，四周枝头花朵含苞待放，梅花间蜂飞蝶舞，表现手法夸张而生动。

2. 风土人情和传统风俗

孝靖皇后的一件方领夹衣绣“艾虎五毒纹”。其中的“艾”即艾草，是一种药用植物，因五月正值其生长旺盛之期，所含艾油最多，治疗病症功效最好。虎作为百兽之长，在古代被视为神兽，可以镇祟辟邪、保佑安宁。古代民间认为五月为毒月，初五日为毒日。因此五月初五，人们争相采艾，或扎作人形，或作虎形，称为艾虎，或佩戴于发际身畔，或挂于门上，用以驱邪辟祟。五月，天气渐热，蛇、蝎、蜥蜴、蟾蜍和蜈蚣等毒虫出没频繁。民间采用各种方法以预防五毒之害。或在屋中贴五毒图，或在饼上绘五毒图案，还有的在衣饰上绣制五毒。这一切均含驱邪之意。《荆楚岁时记》中记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并注文说：“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艾叶以戴之。”[1]《帝京岁时纪胜》

1 （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9 月，第 47 页。

和《燕京岁时记》的“端阳”等节中对此也都有记述[1]。孝靖皇后的这件“艾虎五毒纹”夹衣，就是护身应景的服饰。当时宫廷内，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一起，至十三日，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2]此件夹衣的纹样为：中间绣一卧虎，呈蹲卧状，长尾上卷，回首观望，两目炯炯有神，额间绣一“十”字，姿态宁静。蛇、蝎、晰蜴、蟾蜍、蜈蚣分散在四周的艾草丛中，或爬或跳、或行或动，情态各异，形象逼真〔图五〕。



图五　艾虎五毒纹

万历帝的一双膝袜上绣“三阳开泰”纹。画面上有三只羊，其中间的一只呈团形，象征太阳，两侧的二羊相对，口衔仙草，作奔跑状。三羊上方绣牡丹、玉兰等花卉，下方为草地，两侧绣山石、菊花、芙蓉等。此纹饰取“羊”与“阳”同音，寓意“三阳开泰”。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易经》以正月为泰卦，泰卦有三阳，取冬去春来、阴消阳长的象征。

万历帝还有两双膝袜上绣制了“秋千仕女图”。图中有两架秋千，秋千上各站立一人，正在荡秋千，两侧各一人推拉秋千。从服饰上可以分辨出秋千上的为主人，两侧的则为仕女。在两架秋千周围绣有盛开的桃花、低垂的柳枝和飞舞的蜜蜂。地面上则是茵茵的小草和散落的花朵。整个画面草木繁盛，春意盎然。据明代刘若愚著《酌中志》记载：“清明则秋千节也，戴杨枝于鬓，坤宁宫后及各宫皆安秋千一架”[3]。所以，此纹样是宫内妃嫔及宫女做秋千游戏的反映，也是传统风俗写照。

此类图案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孝靖王氏的百子衣。“百子衣”因衣上绣制的百名童子而得名。用百名童子为装饰，取意“宜男子”，象征多子多福。

百子衣上的这些童子体态丰腴，活泼可爱。他们以一、二、三、五或六人为一组，组成多个游戏玩耍的活动场面。其中有许多是我国北方城市和农村中常见的场景。例如：跳绳图、鞭陀图、踢毽图、蹴鞠图、斗蟋蟀图、放空竹图、杂戏图、翻鞋图等。这些游戏活动在一些记录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的书籍，如《帝京景物略》、《燕京岁时记》、《帝京岁时纪胜》中也常有记载。《帝京景物略》的卷二《灯市》中就曾描述说：“二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轮；一童子跳白光中。曰跳‘白索’”[4]。这描写的是跳绳游戏。而在此书同卷的《春场》中，对玩陀螺的游戏记述得更为详细。书中写道：“陀螺者，木制如小空钟，中实而无柄，绕以鞭之绳而无竹尺，卓于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则转，无声也；视其缓而鞭之，转之无复往。转之急，正如卓立于地上，顶光旋旋，影不动也。”[5]对于踢毽子的游戏，《帝京岁时纪胜·岁时杂记》和《燕京岁时记》都有记载。《帝京岁时纪胜·岁时杂戏》对于踢毽子人的高超技能作了详尽描述：“都门有专艺踢毽子者，手舞足蹈，不少

1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之《五月·端阳》，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年 8 月，第 21 页。［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之《端阳》、《菖蒲、艾子》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年 8 月，第 65 ～ 66 页。

2 （明）刘若愚：《长安客话·酌中志》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 5 月，第 18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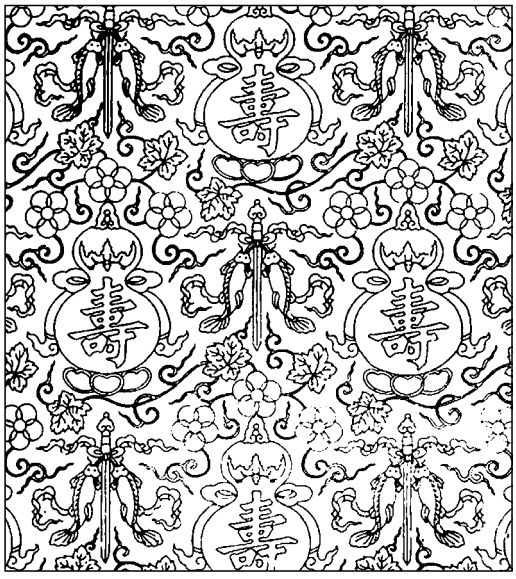
3 （明）刘若愚：《长安客话·酌中志》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 5 月，第 179 页。

4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之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 12 月，第 57 页。

5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之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 12 月，第 65 页。



图六　复制百子衣



图七　子孙万代福寿有余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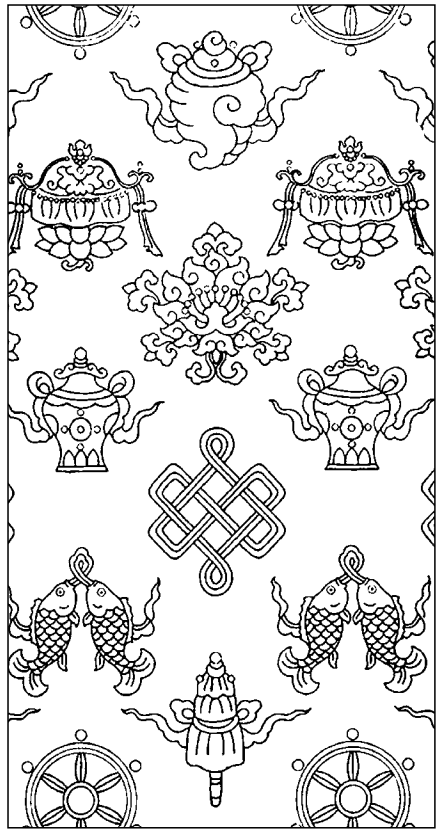
停息，若首若面，若背若胸，团转相击，随其高下，动合相宜，不致坠落，亦博戏中之绝技也。”而《燕京岁时记》则注重介绍毽子的制作工艺及踢毽子的益处。文中写到：“毽儿者，垫以皮钱，衬以铜钱，束以雕翎，缚以皮带。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郁寒。”蹴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用以练武。百子衣上的蹴鞠图共的三人。均身着长袍，头戴小帽。中间一人腰中系带，手戴手套，正在击球。其两侧各站一人，正在观看球技表演。此图与明人王圻著《三才图绘》中的蹴鞠图相同。

绣制在百子衣上的百个活泼可爱的童子，打破了皇家御用的威严，创造了清新自然的氛围〔图六〕。

3. 吉祥图案

此类图案是指富有吉祥寓意的图案。其一是通过吉祥文字，如“喜”、“寿”、“万寿”、“卍寿”、“万寿福喜”、“万事大吉”“百事如意”等文字，以及与这些吉祥文字谐音的事物共同组成的图案。如“蝙蝠”的“蝠”与“福”同音，就用蝙蝠图案与“寿”字组合成“福寿”纹；“羊”与“祥”同音，便用羊象征吉祥；“鱼”与“余”同音，就用鱼纹代表“富足有余”；“海螺”、“葫芦”中有“海”和“湖”之音，就用五只海螺和四只葫芦组成纹饰，寓意“五湖四海”；用江崖与“卍”字组合，组成“江山万代”纹。孝端皇后一件夹衣的纹样中有束腰葫芦纹和宝剑系双鱼纹。葫芦纹的上部饰一蝙蝠，下部为织金“寿”字。葫芦纹和宝剑系双鱼纹中间点缀串枝葫芦的花、叶。该纹样寓意“子孙万代福寿有余”〔图七〕。孝端皇后的另一件夹衣的纹样，被称为“万寿福禄”纹。纹样中上下排列着蝙蝠和神鹿，取“福禄”谐音。神鹿身

上背负着一个“寿”字，寿字上方饰有两个“卍”字纹，“卍”字纹之上又托负着一枚灵芝。这些图样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万寿福禄”的美好寓意。



图八　八吉祥纹

其二是将人物、动物、植物、文字等综合起来加以运用，表达吉祥的祝愿。此类纹样在写实中又有夸张，画面生动，神形兼备，充满艺术的感染力。孝端皇后的一件织金妆花缎方领夹衣纹样，就是此类图案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个。该纹样名为“六合同春群仙祝寿”。“六合”是指天地及四方，泛指天下。“六合同春”便是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民间运用谐音的手法，以“鹿”取“陆”之音；以“鹤”取“合”之音，将“六合”这抽象而广博的事物演绎“鹿”“鹤”两种动物。所以“六合同春”，又名“鹿鹤同春”。“六合同春群仙祝寿”纹，鹿、鹤造型优美。鹿为奔跑状，口衔灵芝。而鹤则被设计为双腿略弯，双翅略展之状，其形态似刚刚栖落，又似震翅欲飞。纹样中除了鹿鹤之外，最为生动的是仙女纹。仙女头梳双螺髻，身著博袖衣，腰系长裙，带自两肩过腋长拖于地，足蹬行云。婷婷玉立，飘逸灵动，形象颇为优美。仙女手捧寿桃或灵芝，神态安祥。名为“六合同春群仙祝寿”，所以纹样中还设计了鲜明的“寿”字。“寿”字两侧是两条相向的升龙，而“寿”字周围则装饰了折枝花果纹和海水江崖纹。整幅纹样呈现出天下皆春、万物祈福祝寿的景象。这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美画卷。

4. 仙道宝物纹

仙道宝物纹主要指“八吉祥”纹和“八宝”纹。

“八吉祥”分别是法轮、海螺、宝伞、天盖、莲花、宝瓶、双鱼和盘长。对“八吉祥”的一般解释是：螺，具菩萨意，妙音吉祥；轮，大法圆转，万劫不息；宝伞，张弛自如，曲覆众生；天盖，偏覆三千，净一切药；莲花，出五浊世，无所染着；宝罐，福智圆满，具完无漏；双鱼，坚固活泼，解脱坏劫；盘长，回环贯彻，一切通明。

“八宝”又称“杂宝”，指珊瑚枝、珊瑚珠、金银锭、单犀角、双犀角、方胜、古钱、宝珠、如意头。构图时一般选用 8 种，有时也选用 4 种或 6 种。

在定陵出土的服饰，“八吉祥”纹和“八宝”纹运用有几个特点，其一，万历皇帝的服饰上运用较多；其二，八吉祥纹又多用作纹样的主题图案，八宝多为配合纹样作地纹；其三，“八吉祥”纹和“八宝”有时单独使用，但较多时候则是与其他纹样组合运用。

万历帝的一件名为“八吉祥纹缎绣四团龙圆领夹龙袍”就单独采用了“八吉祥”纹。纹样中轮、螺、伞、盖、花、瓶、鱼和盘长分作八排，布局规整，纹样疏朗〔图八〕。而孝靖皇后的一件夹衣上纹样则是将八吉祥纹与其他纹样组合使用的。此衣纹样分为上下两排：一排为云龙相间排列，柿蒂内一为团龙纹，一为四个

如意头中饰一方胜纹；另一排，在柿蒂内分别饰轮、螺、伞、盖、花、瓶、鱼和盘长纹。此纹样名为“柿蒂形如意团龙八吉祥纹”，寓意吉祥如意。

万历帝的“织金缎缂丝八团龙圆领夹龙袍”则是以暗花八宝作为地纹。在纹样中，用双犀角与连胜、云头与连胜组合构成底托，托上方饰“卍”“喜”字，并以银锭、古钱、宝珠、珊瑚等小八宝纹的散点排列为点缀，使纹样既内容丰富，布局又疏密有致，繁而不乱。万历帝的一件膝袜上使用的八宝纹更显灵活。其正中位置是一葫芦纹，葫芦上面绘方胜和云头纹。葫芦两侧分别垂挂着飘带，飘带上连缀着犀角、古钱、金锭和方胜纹。

二　纹样组织安排

定陵出土的丝织品纹样取材广泛，种类繁多。如何将这众多的题材组织起来，构成内涵丰富，画面优美的纹样，纹样的组织安排至关重要。为此，定陵出土的丝织品纹样在安排上讲求多样组合、富于变化、讲求色彩搭配等原则。

（一）多样组合，取其寓意

从前文“纹样内容取材”一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定陵出土丝织品纹样取材丰富，种类繁多。而且在组织纹样时，常常是多种题材综合运用，使纹样图案的寓意得以充分表达。前文中提到的“六合同春群仙祝寿图”也是极赋代表性的一个。而万历帝缂丝十二章寿如意衮服，除饰有十二章纹样，也在地纹中缂“卍寿”字、蝙蝠和如意云纹，进行多样组合。

孝靖皇后的一件夹衣上有一胸补，通过动物、植物和吉祥文字的组合，表达了“灵仙祝寿”的美好祝愿。其上纹饰为：左右相向一对玉兔，它口衔灵芝。灵芝上方绣“寿“字；玉兔两侧各绣一升龙，龙首顶部绣万“字”；玉兔之下是寿山福海及八宝纹〔图九〕。

再如孝端皇后的一件裙衣纹样，名为“织金寿字云鹤纹地织金妆花玉女献寿龙襕纹”。其地纹为四合云，鹤衔万卷书，背托织金“寿”字，寿字两上角为“卍”字，云、鹤上下两排排列。上层襕纹样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饰龙戏珠；下为落花流水，浪花中荡漾着灵芝、寿桃和桃花；中间为二十一个飘逸而至、婷婷玉立献寿玉女。玉女间又有鹤、鹿、猴和折枝牡丹、桃花、行云作点缀。下层襕纹样为云龙纹、海水、江崖、寿桃、灵芝等。多种题材综合运用，繁杂而不乱，“六合同春富贵长寿”是其选材的主线。

（二）富于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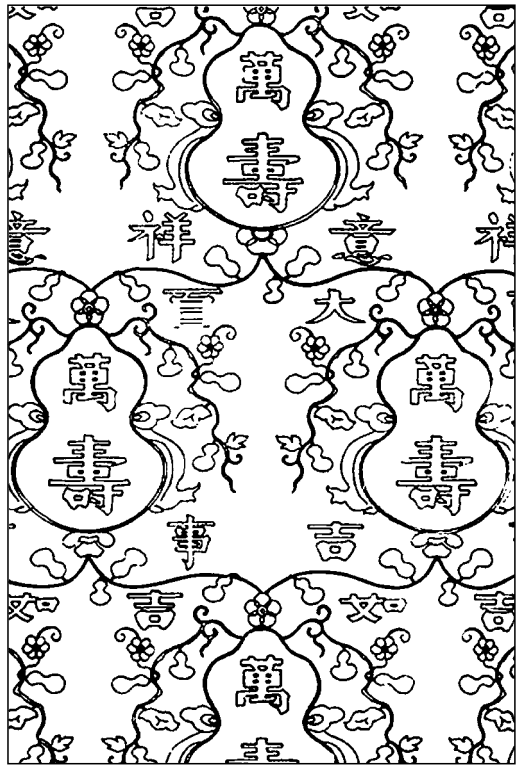
定陵出土丝织品纹样中龙纹所占比例很大。虽然作为章服纹样，龙纹多已程式化，但是纵观定陵出土丝织品龙纹，其姿态在统一中又有变化。因在服饰中所处位置不同，而呈现出各种姿态，其中，有正面团卷的，也有侧面相戏的；有腾飞于海水之上的，又有穿行于祥云之间；有龙首相对戏抢火珠的，更有首尾相接赶珠的。而衬托在龙周围的云纹更是变幻莫测。丝织艺人结合大自然中云气的变化，提炼概括，创造出四合云、大小勾云、行云、卧云、骨朵云、蘑菇云等多种精美图案。有的雄浑大气，有的清新淡雅，它们或卷曲缭绕或流



图九　复制绿织金缠枝莲妆花纱绣灵仙万寿补方领女夹衣

动飘逸在龙纹周围，更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此外，定陵出土丝织品纹样中选用的花卉、果实，种类繁多，使用率很高。为了突出纹样的整体效果，这些花卉有缠枝、串枝、折枝、散花和团花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孝端皇后的一件黄绸丝棉袄纹样，上面饰葫芦和吉祥文字。大葫芦内饰“万寿”字样，而大葫芦之间又饰“百事大吉”“吉祥如意”等吉语。为了表达“万寿子孙万代吉祥如意百事大吉”的寓意，除了运用上述吉语外，其上的葫芦以藤相串，藤上还满缀子孙小葫芦以及葫芦花、葫芦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很好地衬托了“万寿子孙万代吉祥如意百事大吉”的寓意主题〔图十〕[1]。与上述纹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一幅纹样，上饰牡丹花和“卍”、“寿”二字。为了烘托“富贵长寿”的主题，牡丹花选用了缠枝形式，并将“寿”字置于牡丹花上，“卍”字置于花叶间。整幅画面洋溢富贵荣华千秋万代的寓意。前文中提到的名为“缠枝四季花卉凤凰纹”纹样，将牡丹、莲花、菊花、芙蓉四季花卉串连起来，很好地表现了凤凰舒展双翅穿梭于花卉之中优美形态。



图十　万寿子孙万代吉祥如意百事大吉纹

1　图二至图五、图七、图八、图十纹样选取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定陵》一书。

相对于缠枝和串枝的花卉、果实纹，折枝纹样画面更显清爽。如孝靖皇后的一件匹料纹样，由芙蓉、牵牛、菊花、梅花组成，每排一种花型，清新疏朗，别有一番景致。

散花则主要运用在较大型纹样中，例如前文中提及的孝靖皇后的百子衣纹样、“秋千仕女图”、“艾虎五毒纹”等纹样中均有散花，起到点缀装饰作用。

（三）色彩搭配

为了使纹样图案色彩丰富、逼真，富于层次感，定陵出土丝织品纹样在织造时，还讲究色彩的搭配。当然这与明代织机的改良、织造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首先是妆花技术的应用。妆花工艺是在传统的织锦基础上，吸收缂丝断纬的技术，采用局部挖花盘织的织造方法。在织造过程中，依据纹样设计和色彩变化要求，使用不同色彩的纬线进行局部盘织，使配色极度自由，得心应手，往往是一件织品，纹样配色就多达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有些织品除采用彩绒妆花外，还加织金线、孔雀羽线，使整件织品呈现出金彩交辉、富丽堂皇的效果。

其次是缂丝和刺绣技艺的提高及广泛应用。一般织物是通经通纬，而缂丝是通经断纬。通经断纬，使得织造过程中可自由变换色彩，而且图案花纹边缘线条与素地接合处略显高低变化，呈现一丝裂痕，近似镂刻而成。所以，缂丝又被称为“刻丝”。

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衮服共有 5 件，其中 2 件为缂丝制品，名为“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在衮服宫黄色的织地上共用了 28 种色线配色。其中属蓝色系的就有藏青、深监、普蓝、浅蓝、湖蓝、品月、月白；红色系有水红、桃红、朱红、枣红、紫红；绿色系有墨绿、豆绿、翠绿、深草绿、浅草绿；黄色系有明黄、中黄。此外，还有金灿灿的金线和蓝绿闪光的孔雀羽线。丰富的色线及其有机的搭配，使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不仅纹饰内容丰富，且色彩瑰丽豪华，金碧辉煌。

刺绣，是我国的传统工艺。据《尚书》记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章服制度中就有“衣画而裳绣”的规定。经过不断发展，唐、宋时期，刺绣技艺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明代继承了唐、宋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定陵出土的刺绣品有衮服、龙袍、女衣、膝袜等，多达 118 件。数量大，品种多，而且技艺精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孝靖皇后的两件百子衣。

百子衣上百名童子嬉戏场面的妙趣缤纷、栩栩如生，除了工匠艺人注重画面取材和人物造型外，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工匠艺人高超的刺绣水平。他们根据画面内容的需要，结合自己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体验，在针法、用色和用线上匠心独运。

百子衣的刺绣针法有十余种，有抢针（包括正抢和反抢）、铺平、平金、斜缠、盘金、松针、打子、扎针、数和针、刻鳞、订线等种类。并依据不同的刺绣对象，采用不同的针法，例如，童子的脸部、手臂用正抢，衣服用铺针、网绣，龙鳞用平金绣，龙须、龙角、龙鳍用斜缠针。这样绣出的效果，不仅有层次变化，而且使刺绣对象充满了质感。

为使画面既鲜艳明快，又和谐统一，百子衣用色丰富、配色灵活。例如，为追求肤色的真实，童子的面部和手背用肉色，头皮用白色，头发用深青色；为保证画面色彩的变化、突出人物，服饰则选用米红、粉红、

普蓝、浅蓝、绿、艾绿、中黄、宫黄、驼黄、浅褐等色中的二种或三种，搭配使用;为突出龙的威猛、神奇，龙的首、鳞、爪用金线，鳍用月白色，龙角用粉色，龙眼、牙用白色，龙瞳孔用黑色，而龙须则是五颜六色。

百子衣还采用了绒线、金线、孔雀羽线和绒包柱线四种绣线，并巧妙安排，恰当运用，增强刺绣画面的艺术效果。如金线用于龙首、身、爪等部位，突出了龙高贵、华美。而将金线用于人物、花卉纹的钉边，就使人物、花卉鲜亮、光艳。

百子衣，绣工精巧，技艺精湛，色彩富丽，代表了明代刺绣的工艺高超水平。

三　纹样反映出的宫廷服饰变化特点

（一）在遵循旧制的同时追求变化时尚

在《明史・舆服志》、《大明会典》等记录明代冠服制度的典籍中，明代皇帝冠服有冕服、通天冠服、皮弁服、武弁服和常服。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就对全国官民衣冠服饰制定了严格制度，并要求“国朝上下冠服皆损益前代之制”[1]，而冕服作为帝王的礼服自然也作了详细的规定，而且在形制上也基本遵循了古制。而衮服仍上衣下裳、十二章纹饰也分别装饰于上衣下裳之上。但是定陵出土的 5 件衮服不仅将上衣下裳合二为一成为袍式，在十二章纹样的安排上，也与典籍记录的冠服制度有极大出入。这一点在前文“纹样内容题材——龙纹”一节中已有详细说明。

明太祖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提出“复汉宫之威仪”[2]的口号。所谓“汉宫威仪”，实际上是指中原汉族传统的礼仪制度。明太祖朱元璋还强调“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制礼，以辨贵贱，明等威”[3]。服饰作为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不但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辨贵贱，明等威”的工具。因此，明代建国不久，朱元璋就着力于帝后、宗室、公侯、文武官员，乃至庶民服饰的确立。而作为皇帝礼服的衮冕，更是礼制的集中反映。所以，衮冕形制在洪武年间确立，并在永乐年间、嘉靖年间进行了更定。

衮服上衣下裳的形制源于古制，它首要的更多地体现了礼和等级，而将实用穿着效果放在了次要位置。然而，帝王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也会对古制衮服的繁琐感到困惑。他们在遵循古制、强调礼制的同时，也规避着繁琐。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朱元璋身上就已有所体现。“洪武元年，学士陶安请制五冕。太祖曰：此礼太繁。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馀不用。”[4]朱元璋虽然提出了“复汉宫之威仪”，但在实际生活中也是考虑实用性的。

随着明朝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人们的价值观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服饰世俗化功能开始显现。而皇帝常服中的长袍穿着起来更为方便和舒适。因此，衮服特有的十二章纹样便装饰在袍式常服上，一种简化的衮服应运而生了。在日、月、星辰、龙、山、华虫、宗彝、火、藻、粉米、黼和黻这十二章纹样中，龙的

1 《大明会典》卷六十《冠服一》。

2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吴元年冬十月丙寅。

3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洪武三年八月庚申。

4 《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皇帝冕服》。

形象最为生动，所代表的君权形象也更深入人心。所以，以龙为主要纹饰，其他十一种纹样作辅助的新式衮服纹样更诞生了。定陵出土的衮服式样，以及特有纹样表明，作为宫廷服饰在遵循古制之时，又追求变化时尚。

（二）审美情趣向世俗化转变

定陵出土女衣 134 件，均属常服系列。《明史・舆服志》记载皇后冠服制度初定于洪武三年，其中常服于洪武四年和永乐三年又有所更定，但内容没有本质变化，服饰上均只或织或绣龙、凤纹。[1] 然而定陵出土的女衣上却只有 56 件饰有龙、凤纹，而且其中有 50 件龙、凤纹又仅饰在女衣前胸后背的方补中。除此之外的纹样则更多的是民间的传统图案。

前文“纹样内容题材”一节中介绍的“凤穿花纹”、“人物云凤纹”就是饰于女衣衣补上的。饰有“凤穿花纹”衣补的女衣纹样为串枝牡丹纹，饰有“人物云凤纹”衣补的女衣纹为“五湖四海”纹。“五湖四海”纹由两组团花纹组成，其一由 5 个内向的束腰葫芦与花朵相间环状排列，中心为一枚葫芦叶；其二用 4 个内向的海螺环状排列，中心是一轮形团花。两个组团花纹利用 5 只葫芦与 4 只海螺，用世间常见事物和谐音表达了对广袤无垠地域控制欲望。而前文“纹样内容题材”一节中介绍的饰有“藕莲翔鸾”纹、“万寿福禄”纹和“子孙万代福寿有余”纹同样也是饰有凤纹或龙纹衣补的女衣纹样。这几件女衣的纹样与其上的衣补纹样相比，更显丰富多彩、生动优美。

定陵出土的女衣除了在衣补上饰有龙、凤纹外，也有在衣服直接饰龙纹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孝靖皇后的百子衣。百子衣因衣上饰有百名童子而得名，但是在衣的前胸左右襟、后背、两袖、肩部及衣服的镶边等处也都饰有龙纹。然而遍布于整件衣服的百余童子活动的画面所洋溢和散发出的活泼生动、情趣盎然的情调更具冲击力，它们冲淡了龙纹所代表的帝王的威严。

与百子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孝靖皇后的一件名为“红肩通袖柿蒂鹤鹿同春群仙祝寿织金妆花缎方领女夹衣”的纹样，纹样中虽然也有龙纹，但纹样却名为“六合同春群仙祝寿”。因为纹样中奔跑的仙鹿、展翅欲飞的仙鹤、盛开的花朵、飘逸的仙女和夺目的“寿”字，让万物欣欣向荣、“群仙祝寿”的景象跃然呈现，龙纹在这里仅起到表明此为宫廷服饰的作用。

上面介绍的女衣，虽饰有龙、凤纹，但它们只是整件女衣纹样的一小部分，而且表现力在众多的民间纹样映照下略显苍白，未达到突显效果。

定陵出土的大部分女衣中是没有龙、凤纹饰的，相反，其纹样则多源于民间世俗生活。如前文“纹样内容题材”一节中介绍的“艾虎五毒纹”，就是以民间五月初五的风俗为内容题材。再如孝端皇后的“蜂蝶花卉缎女夹衣”和孝靖皇后的“曲水地鹤蚌花蝶纹绸女夹衣”，两件女衣纹样均以自然界的生物为题材，呈现出了浓浓的自然情趣。前者将萱草、扶桑等花卉设计为较大图案，然后将飞舞的蜂蝶和爬行螳螂置于其间，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画面；后者涉及的内容题材更为广泛，不仅有仙鹤、蚌壳、海螺、蝴蝶、水草、花卉、竹枝等生物，还有折扇、骰子和彩蛋等生活用品，设计者将它们巧妙取裁，既优美又亲切。

除了女衣使用了大量的民间传统纹样，出土的万历帝服饰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民间传统纹样。如前文介绍

1 《明史》卷六六《舆服志二・后妃冠服》。

的“八吉祥纹缎绣四团龙圆领夹龙袍”和“织金缎缂丝八团龙圆领夹龙袍”，其上不仅有龙纹，还用“八吉祥”纹和“八宝”纹作点缀、衬托，表达出吉祥如意美好意愿。

定陵出土膝袜 19 双，其上纹样共有 9 类，除了龙戏珠纹，还有“人物故事”纹、“秋千仕女”纹、“三阳开泰”纹、“吉祥花卉”纹、“大吉葫芦”纹、“寿”字花卉纹、“四季花卉”纹和“菱形”纹。这丰富的纹样名称就已充分展现了其纹样题材的类型与范围，让人们感受到了那扑面而来的世俗之风。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大量的丝织品流入市场，进入了普通百姓家。为了迎合广大百姓的需求，丝织品纹样也发生了变化和发展。而百姓更多的是关注流光溢彩的世俗生活、色彩斑斓的身边事物。工匠艺人通过象征、寓意、比拟、谐音、文字等表达方法，将百姓的关注以纹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呈现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富有生活情调的图景，从而表达出对富贵平安、福寿安康、欢乐祥和的祈求。百姓这种朴实而美妙的审美情趣渐渐地影响着宫廷、影响着宫廷服饰，使其纹样呈现了审美情趣向世俗化转变的景象。定陵出土丝织品中大量的取材于民间的传统纹样就是很好的例证。

［作者单位：北京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责任编辑：赵中男　韦心滢）